

德国安全政策话语的变迁

——基于德国联邦议院海外派兵辩论的分析^{*}

倪晓姍 郑春荣

摘 要：德国作为“文明力量”的原型，历来强调用外交手段解决危机与冲突的必要性。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尤其在 1998 年政府更迭后，德国安全政策的参数不仅在地理上得到了扩展，而且在功能上被重新解释为“前摄性危机预防战略”和“反应性危机管理战略”，包括 90 年代中期以来军事手段作为“最后的手段”越来越频繁地被投入使用。鉴于德国在安全政策上的更加积极有为也势必反映在政治精英的相关话语上，本文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不同时期联邦国防军外派的首次议会辩论，以及施罗德关于德国不参与伊拉克战争的政府声明连同其他议员对此提出的动议中使用的论式进行定义、分类和对比分析，认为从施罗德政府时期（1998～2005 年）到默克尔政府时期（2005 年以来），德国安全政策话语中存在着从“战争反思者”到“利益谋求者”的身份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鉴于历史经验教训，德国选择了一种“服务型领导者”的过渡身份。结合德国政治精英安全政策话语的变迁趋势，可以做出研判，新形势下的德国安全政策行动将呈现继续增强的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文明力量”的定位发生根本变化，安全政策的转型依然会是渐进的。

关 键 词：德国； 安全政策； 话语分析； 论式； 联邦国防军外派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 德语语言文学专业 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092

同济大学 德国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所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所长 上海 200092

中图分类号：D751.622

文献标识码：A

文 章 编 号：1005—4871(2018)02—0004—19

^{*}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德国外交政策新动向及我国对策研究”（批准号：14BGJ009）资助。

一、引言

对于东西方冲突结束和两德统一以来德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安全政策），学界普遍认为其呈现出一贯的延续性。然而学界对此也有不同意见，例如赖讷·鲍曼（Rainer Baumann）通过对德国外交政策中的“多边主义”话语的研究，确证了德国多边主义话语的变迁。他认为，虽然德国继续秉承多边主义原则，外交政策的重点在于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积极融入各种国际组织，但与此同时，德国外交政策中的多边主义原则又发生着系统性变化：基于义务的多边主义政策逐渐被基于实用性的多边主义政策所取代，或者说德国追求多边主义更多的是出于德国自身对赢得影响力和身份地位的需求，由此多边主义政策降格为一种可选项甚至被工具化^①。与此相应，沃尔夫·冯·克劳泽（Ulf von Krause）也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已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对此的例证是，1990 年后北约“援助义务”框架以外的联邦国防军外派行动数量增加，军事力量越来越多地被作为“最后的手段（ultima ratio）”投入使用。京特·赫尔曼（Gunther Hellmann）则进一步指出，1998 年德国联邦政府更迭、施罗德（社民党）总理上台后，德国安全政策逐渐出现了地域上的扩展和功能上的重新诠释：本国领土防御的定位被保障和推进东欧、东南欧的民主转型和遏制暴力所取代，威慑和领土防御功能被“前摄性危机预防策略”和“反应性危机管理策略”所替代^②。

上述学者的论断已经过去了 10 多年，人们如今或许可以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变迁与否做出更为清晰的判断，毕竟德国 1998 年以来在安全政策领域的诸多重大决定提供了人们做判断的依据。

本文的核心设问在于，从施罗德时期到默克尔时期，德国在安全政策行动中的自我定位有无呈现出某种转变？为了转换研究视角来进行佐证，本文尝试从德国政治精英围绕联邦国防军海外行动的议会辩论，即安全政策话语来折射这一变化。

二、研究框架

国内迄今的德国外交政策研究主要从政治学理论尤其是从角色理论出发，分

① Rainer Baumann, *Der Wandel des deutschen Multilateralismus: eine diskursanalytische Untersuchung deutscher Außenpolitik*, Baden-Baden: Nomos, 2006, S. 167–168.

② Gunther Hellmann, „Sicherheitspolitik“, in Siegmund Schmidt/Gunther Hellmann/Reinhard Wolf (Hrsg.), *Handbuch zu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7, S. 605–617, hier S. 612.

析德国统一以后的德国外交政策^①,抑或是分析德国外交中价值与利益这两个因素的互动关系^②。近年对德国外交的研究集中在德国默克尔政府外交的积极有为新动向的分析上^③,但是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对相关政府文件的内容分析以及与外交行动的对照。

事实上,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所带来的影响在接下来的时期内远远超出了语言学和哲学领域,进入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其他领域。德国学者开始借助论据(Argument)、论证(Begründung)和论证模式(Argumentationsmuster)或论式(Topos/Topoi)^④概念研究议会辩论和公众辩论,获取和分析社会中的集体性知识^⑤,使用语言学方法为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政治学研究服务。例如,政治语言学最初的系统性研究代表之一,霍尔斯特·鲁格勒特(Horst Grünert)在1974年发表了结合论证分析与传统关键词分析对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的首个全德议会辩论进行研究的专著^⑥;21世纪,尼克拉·霍齐兹(Nicoline Hortzitz)将词汇和风格分析融入论证分析,对1450~1700年的反犹太人话语展开研究,比较了近代早期反犹主义话语中的核心辩论方法和19世纪种族主义推理方法^⑦;马丁·文格勒(Martin Wengeler)对1960~1985年德国移民话语中的媒体篇章进行分析,归纳出24种论式,推动了通过论式分析获取社会中集体性知识、意识倾向和文化刻板印象的研究范式^⑧。

论式区分为普遍论式和特殊论式: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形式化的、以抽象的推理规则为基础的论式是普遍论式;包含具体内容的、以具体的推理规则为基础,且在特定的领域和语境中被使用的是特殊论式^⑨。因为本文围绕德国安全政策话语展开,所以这里引用的论式概念指在话语中频繁出现的、包含特定推理规则的特殊

① 参见熊炜著:《统一以后的德国外交政策(1990—200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参见王友明:《评析默克尔的“价值观外交”》,载《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4期,第53—58页。

③ 参见郑春荣:《德国外交政策的新动向》,载《欧洲研究》,2014年第2期,第9—22页;郑春荣:《德国安全政策新动向分析》,载《欧洲研究》,2017年第1期,第134—151页;周瑾艳:《德国与非洲安全合作的新动向及发展趋势》,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5期,第44—68页。

④ 论式的定义有很多,人们通常认为它是论证模式的同义词,以下统一使用“论式”这一概念。参见Ruth Wodak u. a., *Zur diskursiven Konstruktion nationaler Identität*, Berlin: Suhrkamp, 1998, S. 77.

⑤ Thomas Niehr/Jörg Kilian/Martin Wengeler (Hrsg.), *Handbuch Sprache und Politik*. Bd. 1, Bremen: Hempen, 2017, S. 263.

⑥ 参见Horst Grünert, *Sprache und Politik: Untersuchungen zum Sprachgebrauch der „Paulskirche“*. Bd. 10,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74.

⑦ 参见Nicoline Hortzitz, *Die Sprache der Judenfeindschaft in der frühen Neuzeit (1450—1700)*, Heidelberg: Universitätsverlag WINTER, 2005.

⑧ 参见Martin Wengeler, *Topos und Diskurs: Begründung einer argumentationsanalytischen Methode und ihrer Anwendung auf den Migrationsdiskurs (1960—1985)*,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2003.

⑨ 同上, S. 181—182.

论式^①。论证是通过无争议(或争议较少)的陈述来支持或者反对另一个争议较大的陈述的语言过程,其中“无争议的陈述”即论据(Argument),可根据立场的不同分为正反论据,“有争议的陈述”为结论(Konklusion),将论据和结论关联起来,并确保论据能够支持结论的中间步骤为推理规则(Schlussregel)^②,不同的推理规则是对论式进行定义和分类的基础^③。因为语言行为者通过个人行为构建意义和知识,所以对语言行为者在论证过程中使用的特殊论式进行话语历时分析,可以获取语言行为者在研究区间内的论证策略、思维方式和态度倾向及其产生的变化。

如前所述,本文以德国联邦议院中有关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的辩论为研究对象。根据《议会参与法》,德国联邦国防军的任何外派都需要议会授权,通常在专业委员会提供意见、进行全体表决前,由议员们在联邦议院全体会议上就法案和草案进行辩论,参与辩论的发言者和议会党团针对具体议程为自己的政治立场进行辩护,同时批评对立方的观点^④。本文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通过辩论中呈现出来的话语变化——主要体现为不同时期联邦议院中各党派/议会党团发言人在辩论中使用的论式的变化——来识别和描述行为体的知识和认知变化,解析话语背后的政治意涵,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德国安全政策话语中身份自我定位的延续或转变。之所以选取联邦议院辩论作为话语研究对象,一方面,因为会议记录是具有权威性的真实准确的语料^⑤,且可以在联邦议院网站上获取;另一方面,作为法律、政策的制定者和影响者,联邦议员的发言最能直观不同时期德国政治精英关于德国安全政策的立场和观点。

本文将按如下步骤展开:首先,限定研究时间为施罗德和默克尔政府时期,即第14至第18届联邦议院。该研究时间段涵盖联邦议院中执政党和反对党的

① Walther Kindt, „Argumentation und Konfliktaustragung in Äußerungen über den Golfkrieg“, *Zeitschrift für Sprachwissenschaft*, 1992, 11(2), S. 189–215, hier S. 191, <https://www.degruyter.com/downloadpdf/j/zfs.1992.11.issue-2/zfs.1992.11.2.189/zfs.1992.11.2.189.pdf>, 访问日期:2018-02-26。

② Stephen Toulmin, *Der Gebrauch von Argument*, 2. Auflage, Weinheim: Beltz Athenäum Verlag, 1975, S. 89; Martin Wengeler, *Topos und Diskurs: Begründung einer argumentationsanalytischen Methode und ihre Anwendung auf den Migrationsdiskurs (1960–1985)*, S. 179。

③ 在此举例对论证相关概念作出说明:例1. 维护阿富汗局势稳定(论据1),必须派兵阿富汗(结论1);例2. 造成阿富汗局势恶化(论据2),必须禁止派兵阿富汗(结论2)。上述两种论证的推理规则为“必须支持维护稳定的行动”,两个例子均采用“稳定”论式,可将论式定义为“因为行动能/不能维护稳定,所以必须派/不派兵”。

④ 参见 Bundestag D. Geschäftsordnung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und Geschäftsordnung des Vermittlungsausschusses, 10. 2017, <https://www.btg-bestellservice.de/pdf/10080000.pdf>, 访问日期:2018-02-26。

⑤ 同上。

身份转变以及组阁方式的差异,针对外派行动的政治立场有可能发生变化。其中包括:施罗德执政时期(1998~2002年以及2002~2005年)均为社民党与绿党联合执政;默克尔执政时期,其中2005~2009年以及2013~2017年为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的大联合政府,2009~2013年则为基民盟/基社盟与自民党的联合政府。

其次,研究语料库共包括8个篇章,共计88 808形符(Token)。一方面,综合考虑行动时间、行动规模和影响力以及行动多样性,选取7个不同性质的海外行动,分别属于“军事维稳”“打击恐怖主义”“维护海上安全”以及“提供武装训练”,将上述行动的联邦议院首轮辩论的会议记录作为研究对象^①。选取首轮辩论,是因为一般在这个辩论阶段,各政党、党团或政治精英之间的观点争锋最为激烈。另一方面,考虑到施罗德在2003年拒绝参与伊拉克战争这一表态在德国安全政策上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其文本类型——施罗德的政府声明以及当时的反对党基民盟/基社盟提出的包含相反观点的动议——与以上7次行动的议会辩论不一致,但它们在结构和形式上具有可比性,故将其补充入研究语料库(见表1)。

最后,在研究语料库的人工阅读过程中,借助计算机软件^②对论式进行编码,归纳总结出包含子类别的德国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论式分类方案^③,以观察不同政府时期在辩论过程中,联邦议员所使用的论式类别的差异,体现不同时期德国政治精英安全政策话语中身份认知的延续或转变。

表1 语料库中包含的德国联邦国防军海外行动和反伊拉克战争辩论

行动性质	行动简介
军事维稳	1999年“科索沃国际安全驻军”。基于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1999)号决议,确保难民返回的安全环境,为科索沃的和平稳定提供军事保障。
	2006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基于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2006)号决议,旨在帮助维护该地区的稳定,阻止非法武器流入。

① 联邦议院全体大会首轮磋商后,相关建议草案被转交给相关专业委员会,由其为联邦议院决议提供建议,最后由联邦议院全体议员根据专业委员会的决议建议投票作出最后决定。发言者一般作为所属议会党团或者党派的“传声筒”,有时也不排除夹杂个人立场的观点。参见 Bundestag D. Geschäftsordnung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und Geschäftsordnung des Vermittlungsausschusses, 10. 2017, <https://www.btg-bestellservice.de/pdf/10080000.pdf>, 访问日期:2018-02-26。

② 话语分析的编程工作得益于计算机技术,本研究采用 MAXQDA Analytics Pro 2018 计算机质性和混合方法数据分析软件对话语进行编码,一方面能够使用定量分析方法通过可视化操作对变化趋势和差异点做描述和对比,另一方面也能够对具体论据使用变化和导致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和阐释。

③ 编码本身是一个基于知识的针对原文的解码过程,深受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影响。需说明的是,在本文研究的编码过程中,发现发言人经常在发言中多次使用某个论据来强调自己的立场,这种情况只计算作一个论据。

续表 1

行动性质	行动简介
打击恐怖主义	2001 年,纽约和华盛顿遭遇恐怖袭击后,德国履行《北大西洋公约》共同防御义务,应美国请求,派兵参加在阿富汗的反恐怖主义军事行动。
	2015 年,巴黎发生恐怖袭击后,德国根据《欧盟条约》第 42 条第 7 款规定“如某一成员国领土遭到武装入侵,其他成员国应遵照《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承担尽其所能向其提供援助与协助的义务”,派兵向法国和国际“反伊斯兰国”联盟提供军事支持。
维护海上安全	2008 年,欧盟“索马利亚特兰大支援部队”。打击亚丁湾和印度洋海域的海盗活动,保护世界粮食计划署、海员和商船在非洲角运输业务的安全。
	2016 年,北约“海洋卫士”海上安全行动。进行海上监视,以打击恐怖主义及其在地中海的能力建设,确保及时识别和对抗海上危机的事态发展。
武装训练	2013 年,援引联合国安理会第 2085 号决议,参与法国对马里的军事行动,主要负责训练任务,确保马里武装部队具有保护本国领土完整和安全的能力。
反对伊拉克战争	2003 年,施罗德宣布德国不同意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实现伊拉克战争合法化的任何决议,并在政府声明中对该立场进行解释和辩护。

来源:作者自制。

三、德国联邦国防军外派话语的论证分析

本章首先介绍德国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论式的分类方案,然后借助不同时期联邦议院中各党派/议会党团发言人在辩论中使用的论式的变化,来反映德国政治精英在德国安全政策话语中构建的身份自我定位的延续或转变。

(一)论式的分类

赖讷·鲍曼基于现有关于德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文献,为其实证研究制定了一个包含子类别的、推行多边主义政策理由的四大论式:出于义务、出于必要性、出于有用性以及作为确保影响力的手段^①。笔者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施罗德和默克尔政府时期联邦议院中关于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的会议记录进行阅读,制定出一个包括“义务”论式、“必要性”论式、“益处”论式、“能力与准备”论式及其子类别的“德国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论式分类方案”,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德国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论式分类方案

论式类别	论式子类别
“义务”论式	“法律法规”论式
	“普适原则”论式
	“德国历史”论式
	“期望和请求”论式

^① Rainer Baumann, *Der Wandel des deutschen Multilateralismus: eine diskursanalytische Untersuchung deutscher Außenpolitik*, S. 105.

续表 2

论式类别	论式子类别
“必要性”论式	“全球依赖性”论式
	“欧洲一体化”论式
	“德国基本利益”论式
	“所涉及国家/地区基本利益”论式
	“军事行动必要性”论式
“益处”论式	“有益于全球”论式
	“有益于欧洲”论式
	“有益于行动涉及国家/地区”论式
	“有益于德国”论式
“能力和准备”论式	“能力”论式
	“准备”论式

来源:作者自制

1. “义务”论式:因为德国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决定是/不是一种理应如此的、适当的行为,所以应该/不应该派兵。出发点包括法律法规、普适原则、德国历史、期望和请求。其论式子类别定义如下:

“法律法规”论式:因为海外派兵决定基于/无法基于特定的法律法规,所以应该/不应该派兵。主要法律基础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联合国宪章》等。辩论中,既可以根据具体的法律法规论证军事行动具有合法性,也可以对相关法律法规的适用性、准确性提出质疑,以彻底推翻行动合法性来反对派兵。

“普适原则”论式:因为海外派兵决定符合/不符合普适的价值观、原则和标准,所以应该/不应该派兵。普适原则指一种被普遍推崇的价值,这里涉及和平、民主、人权、欧洲大西洋价值体系、集体团结等。

“德国历史”论式:因为海外派兵决定符合/不符合德国历史的经验教训,所以应该/不应该派兵。例如,德国曾经在纳粹专制统治下走上一条“特殊道路”,这条道路最终导致德国、欧洲甚至全球陷入灾难。辩论中,联邦议院通过论证海外派兵决定是/不是在重蹈“特殊道路”的覆辙、有/没有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支持自己认为应该/不应该派兵的观点。

“期望和请求”论式:因为海外派兵决定符合/不符合相应的期望和请求,所以应该/不应该派兵。这里的期望和请求一方面是来自外部的期望、要求和请求,如西方合作伙伴(除西方各国外,还包括欧盟)、国际社会、行动涉及国家/地区等;另一方面是来自德国内部,如德国社会民众、政界等。

2. “必要性”论式:因为海外派兵决定具有/不具有必要性,所以应该/不应该派兵。该论式基于“事实的要求”,具有“功效伦理”的倾向。其论式子类别定义

如下：

“全球依赖性”与“欧洲一体化”论式：因为从全球依赖性/欧洲一体化的角度出发，海外派兵决定具有/不具有必要性，所以应该/不应该派兵。例如，因为某个问题会因为全球化/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而波及德国，或者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自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德国必须派兵参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某问题是某个国家/地区内部的问题，必须由该国家/地区自行解决，而德国不应进行干预，所以不应该派兵。

“德国基本利益”论式：因为海外派兵决定保障/损害德国的基本利益，所以应该/不应该派兵。有别于“普适标准”强调世界和平、保护人权等，这里将德国基本利益定义为安全、自由、和平、稳定等。相较前者，这里明确突出对德国利益的考虑。

“所涉及国家/地区基本利益”论式：因为海外派兵决定保障/损害所涉及国家/地区基本利益，所以应该/不应该派兵。这里将所涉及国家/地区基本利益定义为该国家/地区的安全、自由、和平和稳定等。

“军事行动必要性”论式：因为军事行动是/不是必要的，所以应该/不应该派兵。这里指联邦议院辩论中直接针对使用军事手段的必要性进行辩论，按照立场可以分为：德国应该派兵，因为军事手段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德国应该派兵，但是仅仅依靠军事手段是不足够的，必须与其他手段一同使用；德国不应该派兵，因为军事手段是“最后的手段”，而目前仍存在和平的解决方法；德国不应该派兵，因为军事手段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

3. “益处”论式：因为海外派兵决定能/不能带来益处，所以应该/不应该派兵。这类论式完全出于对“实用性”的考虑，既不具有强制性，也并非完全不可被替代。区别于“基本利益”论式，这里指的是“安全、自由、和平、稳定”基本层面以外的、能够为行为体带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其他益处。

这里可以具体区分为“有益于全球”“有益于欧洲”“有益于行动涉及国家/地区”和“有益于德国”论式。所以，此类论式可定义为：因为海外派兵决定能/不能给全球、欧洲、行动涉及国家/地区、德国带来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利益，所以应该/不应该派兵。

其中，“有益于欧洲”论式中“欧洲”一词背后可能有多种内涵，即地理概念的欧洲、欧盟或是借欧洲暗示行动能/不能为包含在欧洲中的德国带来的益处。对于“有益于德国”论式，讨论涉及参与军事行动能/不能为德国在重大问题上赢得共同决策权，对国际组织或者其他国家，尤其是对美国产生影响等。

4. “能力和准备”论式：如果说以上三大论式是从合法性角度出发讨论是否应该派兵，那么第四类论式则是从可行性角度出发。

“能力”论式:因为德国联邦国防军、包括德国联邦国防军在内的行动部队具备/不具备相应的行动能力,所以应该/不应该派兵。这里的行动能力指军事装备能力、行动执行能力、合作协调能力等在可能对行动结果造成影响的多方面能力;能力主体不仅指德国联邦国防军,还指在联合行动中包括德国联邦国防军在内的行动部队。

“准备”论式:因为德国联邦国防军、包括德国联邦国防军在内的行动部队做好/尚未做好相应的军事行动,所以应该/不应该派兵。这里涉及从心理和装备角度是否做好参与军事行动的准备,这会影响到行动的成败或能否达到预期效果。

(二)论式的使用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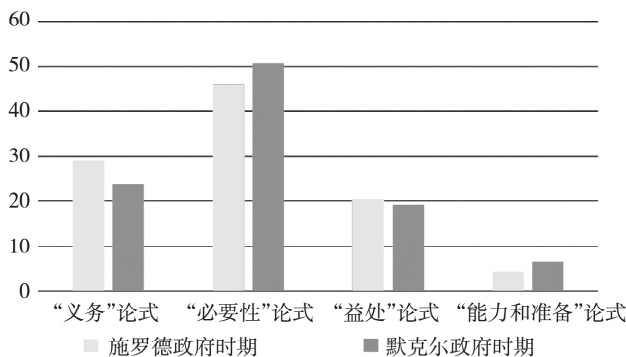


图1 施罗德政府时期和默克尔政府时期的四大论式使用对比

来源:作者自制。

从四个论式大类的使用情况来看,施罗德和默克尔政府时期的议会辩论中“必要性”论式的使用频率均为最高,其次是“义务”和“益处”论式,“能力和准备”论式的使用频率最低,在这方面体现出德国政治精英们在关于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辩论中论式使用偏好的延续性。如果进一步对比两个时期论式使用的比例,可以看到一些变化:默克尔政府时期的德国政治精英在辩论中使用“必要性”和“能力和准备”论式的比例上升,而使用“义务”和“益处”论式的比例则呈下降趋势。

从四个论式大类的使用情况的变化来看,“义务”论式和“必要性”论式的使用呈现较为明显的变化^①:其中,施罗德时期的政治精英更多地使用“义务”论式,更注重塑造出一个积极维护普世价值观、反对战争、考虑外部期望和反思历史者的形象;而默克尔政府时期的政治精英则更多地使用“必要性”论式,面对冲突时展现出更注重行动实用性的冷静理性的形象。鉴于“能力和准备”论式的使用基数较小,

^① 默克尔政府时期使用“义务”论式的频率下降了5.5%,但“必要性”论式却上升了4.8%。

默克尔政府时期的增长幅度虽然不是最大^①，但也意味着一个重要的转变，即这一时期德国政治精英围绕德国参与军事行动的可行性的辩论增加，将自己作为和其他行为体同等的“正常化的参与者”，关心本国或共同行动者的军事能力和军事准备能否成功实现外派任务。

论式使用上更加具体的变化，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德国政治精英的身份定位的延续或转变，需要深入分析论式子类别的使用变化，并结合不同派兵行动辩论中各党派或议会党团发言人的具体观点作进一步的比较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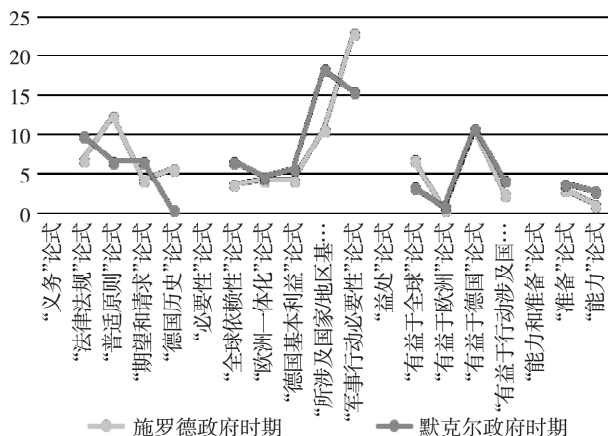


图2 施罗德政府时期和默克尔政府时期的子论式使用对比

来源：作者自制。

“义务”论式的子论式使用情况变化：

施罗德时期的德国政治精英在辩论中使用“普适原则”和“德国历史”论式的比例高于默克尔时期^②，体现出这一时期的德国政治精英^①强调包括和平、民主、人权在内的普适价值，尤其重视消除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威胁、强调人道主义以及文明世界价值体系：例如在阿富汗行动辩论中，支持派兵的阵营一致认同“‘9·11事件’后与阿富汗有关联的基地组织和本·拉登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也是对德国的威胁”^③；在伊拉克战争辩论中，社民党代表格诺特·厄尔勒(Gernot Erler)指出“德国拒绝参与伊拉克战争可能导致欧美共同价值体系发生变化”^④。^②强调履行团结义务的重要性，认为德国作为国际社会、国际组织、欧盟成员国之一，派兵是出于不可推

① 默克尔政府时期使用“能力和准备”论式的频率上升了2.3%。

② 施罗德时期使用“普适原则”和“德国历史”论式的频率分别高于默克尔时期5.8%和5.1%。

③ Bundesminister Joseph Fischer, BT PIPr 14/198, 08. 11. 2001, S. 19294 A.

④ Gernot Erler (SPD), BT PIPr 15/25, 13. 02. 2003, S. 1889 B.

卸的义务:例如在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辩论中,德国外交部部长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社民党)称“巴黎恐袭后,法国成为首个援引《里斯本条约》第42条第7款援助条款的成员国,德国派兵是基于履行欧盟援助条款义务”^①。③强调要吸取历史教训,避免走“特殊道路”,还提醒德国不能忘记美国在战后予以的援助,注重维护德美关系的发展:例如阿富汗行动辩论中基民盟/基社盟代表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强调“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独善其身就是走一条德国的特殊道路,是错误的想法。德国必须同其他国家一样承担起责任”^②，“我们这么做,是因为美利坚合众国为我们的自由和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③;在反对参加伊拉克战争的政府声明中,施罗德称“联系德国和美国人民的不再仅仅是结束纳粹独裁统治后美国在德国民主重建方面提供的援助,而是深深渗透在两国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归属感,两国人民相互尊重、追求共同目标的友谊”^④,而持相反观点的基民盟/基社盟代表沃尔夫冈·朔依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博士指责施罗德“正带领德国重新走上一条德国‘特殊道路’,这最终将导致世界面临更加脆弱的和平和安全”^⑤。

默克尔时期的德国政治精英在辩论中使用“法律法规”和“期望和请求”论式的比例高于施罗德时期^⑥,这突出默克尔政府时期政治精英①更注重“理据”而非“情感”,强调行动是否符合国际法等法律基础:例如在亚特兰大行动辩论中,基民盟/基社盟代表桃乐茜·贝尔(Dorothee Bär)强调“该行动基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行动的执行与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息息相关”^⑦,而左翼党代表诺曼·派奇(Norman Paech)则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军事行动违背德国宪法要求,目前讨论的任务内容包括向船只开火,这已超出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授权范围。警察和军队分离是德国基本宪法原则之一”^⑧;在黎巴嫩行动辩论中,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强调“黎巴嫩和以色列都明确要求德国参加这一任务”^⑨,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荣格(Franz Josef Jung)(基民盟)也强调行动是对“联合国第1701号决议的支持和实施,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找到解决中东问题的和平的政治解决方案”^⑩。②重视

① Bundesminister Dr. Frank-Walter Steinmeier, BT PIPr 18/142, 11. 06. 1999, S. 13883 C.

② Friedrich Merz (CDU/CSU), BT PIPr 14/198, 08. 11. 2001, S. 19287 D.

③ 同上, S. 19288 A.

④ Gerhard Schröder, Bundeskanzler, BT PIPr 15/25, 13. 02. 2003, S. 1876 B.

⑤ Dr. Wolfgang Schäuble (CDU/CSU), BT PIPr 15/25, 13. 02. 2003, S. 1904 B.

⑥ 默克尔时期使用“法律法规”和“期望和请求”论式的频率分别高于施罗德时期3.1%和2.3%。

⑦ Dorothee Bär (CDU/CSU), BT PIPr 16/195, 17. 12. 2008, S. 21067 B.

⑧ Dr. Norman Paech (DIE LINKE), BT PIPr 16/195, 17. 12. 2008, S. 21063 B.

⑨ Dr. Frank-Walter Steinmeier, Bundesminister des Auswärtigen, BT PIPr 16/49, 19. 12. 2006, S. 4799 D.

⑩ Bundesminister Dr. Franz Josef Jung, BT PIPr 16/49, 19. 12. 2006, S. 4804 C.

国内外的希望和请求,尤其重视外部对德国提出的请求,一方面可以将其视为对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曾提出的“德国要在各方面满足国际社会期望”的延续,另一方面更是将其作为赢得信任、获取影响力的途径:例如在黎巴嫩行动辩论中,国防部长荣格指出“行动的前提条件是黎巴嫩政府向我们提出了请求……”,而反对派兵的个人议员格尔特·维克尔迈耶(Gert Winkelmeier)提出“据我们所知,三分之二的德国民众拒绝联邦国防军参与黎巴嫩行动”^①;在“海洋卫士”行动辩论中,议会国务秘书拉尔夫·布劳克齐泊尔(Ralf Brauksiepe)博士代表联邦国防部部长发言,认为“德国被要求参与行动,并且我们也有意愿参与行动”^②。③“履行团结义务”在这一时期成为具有争议的论据,不同阵营分别提出对“团结概念”的解释,出现了抛弃“无限制的团结”的声音:在阿富汗行动辩论中,民社党(即后来的左翼党)代表罗兰德·克劳斯(Roland Claus)呼吁“从‘无限制的团结’中走出,开始重视……‘批判的团结’”^③。

“必要性”论式的子论式使用情况变化:

施罗德时期德国政治精英在辩论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军事行动必要性”论式,约占该时期整体论式使用的一半,与默克尔时期相比也高出7.5%^④;从具体辩论中可以进一步看出,施罗德时期的德国政治精英主要使用该论式以支持拒绝派兵的观点,对使用军事手段持怀疑态度,而对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抱有乐观态度,体现出“军事克制”的延续:例如在科索沃行动辩论中,来自民社党的格列高·居西(Gregor Gysi)一再强调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战争不应被视为外交的补充手段,必须禁止将战争作为政治手段之一。人们应重视使用政治、外交和经济手段作为打击侵犯人权、破坏国际秩序行为的解决方案”^⑤;在关于拒绝参与阿富汗战争的政府声明中,施罗德称“使用军事手段的前提是不存在其他方案,但德国与法国、俄罗斯、中国等其他国家一致认为存在着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我们正努力推动这个方案的实施”^⑥。虽然这一论式在默克尔时期的安全话语中的使用呈下降趋势,但是从具体的辩论方向和内容可以看出该时期的德国政治精英对于使用军事手段的观点呈现新的特点,如①认为军事行动是必不可少的冲突解决手段,是其他和平手段使用的前提:例如在黎巴嫩行动辩论中,联邦国防部部长荣格称“没

① Gert Winkelmeier (fraktionslos), BT PIPr 16/49, 19. 12. 2006, S. 4814 D.

② Dr. Ralf Brauksiepe, Parl. Staatssekretär bei der Bundesministerin der Verteidigung, BT PIPr 18/190, 22. 09. 2016, S. 18868 C.

③ Roland Claus (PDS), BT PIPr 14/198, 08. 11. 2001, S. 19297 D.

④ 施罗德政府时期使用“必要性”论式的频率占四大论式的45.9%,其中使用“军事行动必要性”论式的频率为23%,相比之下该论式在默克尔时期的使用频率下降至15.5%。

⑤ Dr. Gregor Gysi (PDS), BT PIPr 14/43, 11. 06. 1999, S. 3571 B.

⑥ Bundeskanzler Gerhard Schröder, BT PIPr 15/25, 13. 02. 2003, S. 1878 A.

有停火,任何的政治手段都无法实施,所以首先通过军事手段实现较长时间的停火状态必不可少”^①;②明确指出军事行动作为“预防性策略”的性质:例如在“海洋卫士”行动辩论中,议会国务秘书布劳克齐泊尔博士指出“在当地部署特派团可起到预防性维稳的作用”^②。

此外,无论在施罗德还是默克尔时期,“所涉及国家/地区基本利益”论式的使用频率均高于同一时期的“全球依赖性”“欧洲一体化”和“德国基本利益”论式,并且在默克尔政府时期,“所涉及国家/地区基本利益”论式的使用频率超过“军事行动必要性”论式。相较于施罗德政府时期,默克尔政府时期德国政治精英在辩论中使用“所涉及国家/地区基本利益”论式的频率有着最为明显的增幅^③,这一变化呈现出德国政治精英们致力塑造一种“服务者”的身份。这种身份定位指德国在制定包括海外派兵在内的政策决策时,将“他人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前,行动的出发点在于为他人服务;但是可以看出,行动结果很大程度上将惠及自身。辩论中具体体现为重视军事行动能否维护其他国家/地区基本利益、能否解决该区域的根本问题,强调通过军事行动实现当地的和平、稳定、安全、自由,致力于帮助当地国家建立政权、实现当地政府独立自治和军事维稳方面行为能力的建设:例如在黎巴嫩行动辩论中,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指出“黎巴嫩必须建立一个有能力对内对外行使主权的强有力的政府,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德国不仅派出军队,还应该派出边界安保和海关官员协助黎巴嫩政府保障边界和贝鲁特机场安全,防止武器滥用”^④;在索马利亚特兰大行动辩论中,基民盟/基社盟代表桃乐茜·贝尔指出“联邦国防军士兵能够协助维护索马里沿海水域安全,防止海盗袭击造成生命、财产损失”^⑤,而来自左翼党的反对者诺曼·派奇博士认为“行动对于根除海盗问题、消除索马里人民的贫穷和恢复海岸安全起不到作用”^⑥;在马里行动辩论中,基民盟/基社盟代表弗洛里安·韩(Florian Hahn)强调行动的必要性在于“实现这个国家的长期稳定”^⑦等。

剩下的“全球依赖性”“欧洲一体化”以及“德国基本利益”论式的使用在默克尔政府时期政治精英的辩论中均呈现增长趋势,且“全球依赖性”论式使用的增幅大

① Dr. Franz Josef Jung, Bundesminister der Verteidigung, BT PIPr 16/49, 19. 09. 2006, S. 4803 B.

② Dr. Ralf Brauksiepe, Parl. Staatssekretär bei der Bundesministerin der Verteidigung, BT PIPr 18/190, 22. 09. 2016, S. 18668 D.

③ 默克尔政府时期使用“所涉及国家/地区基本利益”论式的频率为18.3%,相较于施罗德时期增长了7.7%,增幅为所有论式使用变化中最大的。

④ Dr. Frank-Walter Steinmeier, Bundesminister des Auswärtigen, BT PIPr 16/49, 19. 12. 2006, S. 4800 C.

⑤ Dorothee Bär (CDU/CSU), BT PIPr 16/195, 17. 12. 2008, S. 21067 A.

⑥ Dr. Norman Paech (DIE LINKE), BT PIPr 16/195, 17. 12. 2008, S. 21063 A.

⑦ Florian Hahn (CDU/CSU), BT PIPr 17/221, 20. 02. 2013, S. 27466 C.

于“欧洲一体化”和“德国基本利益”论式；施罗德时期的德国政治精英使用“全球依赖性”论式的比例在“必要性”论式中尚处于最末，而默克尔时期的政治精英们对于“全球依赖性”的考虑不仅增加，还超过“德国基本利益”和“欧洲一体化”论式。这一变化体现出德国政治精英们开始更多地将目光放至全球层面，强调塑造德国在国际行动中共同参与者的身份，包括借助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平台在国际舞台上追求更多的话语权：例如在黎巴嫩行动辩论中，联邦国防部部长荣格总结称参与行动“符合我们的价值观，也符合我们的国际义务和欧洲义务，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①；在马里行动辩论中，来自社民党的莱纳·阿诺德(Rainer Arnold)指出“结束马里过去十五年的不稳定局势，在这方面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责任”^②；在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辩论中，联邦国防部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称“这场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是一场全球性的斗争，我们与荷兰、比利时、英国、意大利、丹麦和法国一同参与，一同承担责任与风险”^③；在“海洋卫士”海上安全行动辩论中，基民盟/基社盟代表罗德里希·吉泽尔维特(Roderich Kiesewetter)称“不同于传统的军事行动，这是一场北约和欧盟紧密配合的联合行动，旨在为伙伴国家提供支援，我们应该参与这场新式的斗争”^④。

虽然“德国基本利益”论式使用的增幅不大，仅为1.3%，但是从具体辩论中德国政治精英使用的具体论据可以看出着重点发生了偏移：在施罗德时期，政治精英们重视参与行动^①能否保护德国《基本法》中强调的价值^⑤；^②能否维护德国社会的自由、法治和民主^⑥；^③是否会危害统一后的德国的未来利益^⑦。默克尔时期，由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以及德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德国政治精英^①对于参与行动能否消除可以给德国社会的安定和稳定带来的包括恐怖主义在内威胁的关注增加；^②为防止海外恐怖主义给德国社会造成威胁，呼吁德国形成对内以及对外的“防御性民主(wehrhafte Demokratie)”^⑧；^③对包括安全稳定在内的德国基本利益的影响，不仅在范围上而且在意义上有了新的扩展：考虑行动能否保障德国本土以及德国在海外的安定和稳定，例如德国在亚丁湾进行海上贸易时的安全利益的保障^⑨。

① Dr. Franz Josef Jung, Bundesminister der Verteidigung, BT PIPr 16/49, 19. 09. 2006, S. 4803 C.

② Rainer Arnold (SPD), BT PIPr 17/221, 20. 02. 2013, S. 27457 B.

③ Dr. Ursula von der Leyen, Bundesministerin der Verteidigung, BT PIPr 18/142, 02. 12. 2015, S. 13888 B.

④ Roderich Kiesewetter (CDU/CSU), BT PIPr 18/190, 22. 09. 2016, S. 18874 B/C.

⑤ Bundeskanzler Gerhard Schröder, BT PIPr 14/198, 11. 08. 2001, S. 14198 B.

⑥ Bundesminister Rudolf Scharping, BT PIPr 14/198, 11. 08. 2001, S. 19299 B.

⑦ Dr. Ludger Volmer (BÜNDNIS 90/DIE GRÜNEN), BT PIPr 15/25, 13. 02. 2003, S. 1901 D.

⑧ Bundesminister Dr. Guido Westerwelle, BT PIPr 17/221, 20. 02. 2013, S. 27460 D.

⑨ Dorothee Bär, BT PIPr 16/195, 17. 12. 2008, S. 21067 D.

“益处”论式的子论式使用情况变化：

无论是施罗德时期还是默克尔时期，德国政治精英在辩论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益处”论式都是“有益于德国”论式，约占各时期整体论式的一半，默克尔时期“有益于德国”论式使用有所增长，虽涨幅不大，仅为0.2%。从辩论中可以看出，施罗德时期的德国政治精英通过“有益于德国”论式体现对于塑造德国在国际行动中的“参与者”角色的追求，而到了默克尔时期，他们更积极地追求成为行动的“领导者”，不仅要为德国在国际社会和区域合作中赢得话语权，还要在国际组织中获得决策的塑造能力和国际冲突中的斡旋能力等。

此外，话语中“益处”论式的使用反映出德国政治精英在德国安全政策话语中构建的身份自我定位的延续，一方面体现在，两个时期的德国政治精英都注重参与行动是否能够德国赢得盟友或者其他国家的信任：例如在科索沃行动辩论中，基民盟/基社盟代表保罗·布洛伊尔(Paul Breuer)认为“该行动对德国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参与该行动将为德国联邦国防军获得自己的安全负责区，这意味着德国能够与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展开合作，共同承担责任”^①；在黎巴嫩行动辩论中，联邦外交部部长施泰因迈尔强调“黎巴嫩行动事关德国信誉以及其他国家对于德国‘正常化’状态的认可”^②；在“海洋卫士”行动辩论中，基民盟/基社盟的吉泽尔维特称“参与此次行动意在向地中海沿岸国家表明，德国是安全共同体的一分子”^③。另一方面体现在，参与行动能否加强德国的影响力，是否有助于德国对外表示承担责任的意愿：例如在阿富汗行动辩论中，施罗德明确提出“我们希望在行动中做出贡献，以表明德国愿意通过具体行动更多地承担全球责任”^④，联邦国防部部长鲁道夫·沙尔平(Rudolf Scharping)提出“如果德国不参与行动，就可能失去对美国施加影响、履行多边责任和构建共同行动政策的能力”^⑤；在黎巴嫩行动辩论中，联盟90/绿党代表弗里茨·库恩(Fritz Kuhn)认为参与行动能够增强“德国在黎巴嫩问题上的斡旋能力”^⑥。

差异体现在，施罗德时期的政治精英认为必须参与行动时经常将“德美关系”作为考量因素，例如在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辩论中，反对党认为德国拒绝参加伊拉克战争会“严重影响德美关系”^⑦，包括在经济方面，一旦德国没有了作为“世界经济火

① Paul Breuer (CDU/CSU), BT PIPr 14/43, 11. 06. 1999, S. 3577 B.

② Dr. Frank-Walter Steinmeier, Bundesminister des Auswärtigen, BT PIPr 16/49, 19. 09. 2006, S. 4799 D.

③ Roderich Kiesewetter (CDU/CSU), BT PIPr 18/190, 22. 09. 2016, S. 18874 B.

④ Bundeskanzler Gerhard Schröder, BT PIPr 14/198, 08. 11. 2001, S. 19285 A.

⑤ Rudolf Scharping, Bundesminister der Verteidigung, BT PIPr 14/198, 08. 11. 2001, S. 19229 D.

⑥ Fritz Kuhn (BÜNDNIS 90/DIE GRÜNEN), BT PIPr 16/49, 19. 09. 2006, S. 4807 A-C.

⑦ Dr. Wolfgang Schäuble (CDU/CSU), BT PIPr 15/25, 13. 02. 2003, S. 1903 C.

车头”的美国的的支持,将面临重大的经济损失^①;而默克尔时期,德国政治精英们开始关注与第三世界国家、地区展开多边合作,将能够促进多边合作作为支持派兵的论据:例如联邦经济合作和发展部部长海德玛丽·维乔雷克-措伊尔(Heidemarie Wieczorek-Zeul)支持德国参与黎巴嫩联合军事行动,认为“黎巴嫩有可能再次成为德国发展合作的伙伴国家”^②。而反对参与军事行动时,默克尔时期的政治精英经常将“损害德国声誉”作为论据:例如在黎巴嫩行动辩论中,非议会党团成员格尔特·维克尔迈耶认为“只有致力于通过民事手段解决当地的冲突,才能为德国赢得更高的声誉”^③;在反对德国参与“反伊斯兰国行动”中,左翼党代表狄特马·巴兹(Dietmar Bartsch)博士表示,“如果德国海军参与作战,我们将成为‘参战者’,就中期影响来看,这将导致我们失去与该地区阿拉伯国家的良好外交关系”^④。

除此之外,“有益于所涉及国家/地区”和“有益于欧洲”论式的使用在默克尔时期都呈增长趋势,且前者使用涨幅最大,成默克尔时期政治精英辩论中第三重要的论式^⑤。从该论式的使用中可以看出,默克尔时期政治精英以“服务者”自居,不仅强调实现和保障行动涉及国家/地区的利益,还围绕冲突的根源进行探讨,寻求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例如在黎巴嫩行动辩论中,联邦外交部部长施泰因迈尔称“行动的主要任务是将海上武器走私阻挡在黎巴嫩国界之外”^⑥;在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辩论中,反对阵营的左翼党代表狄特马·巴兹指出“参与行动将导致该地区暴力和复仇的恶性循环”^⑦;在索马里行动辩论中,来自左翼党的诺曼·派奇博士认为“索马里海域的问题不是这次行动可以解决的,因为根源在于国际渔船在该海域的作业迫使当地渔民失业,从而导致许多渔民为了生存而成为海盗”^⑧;在“海洋卫士”行动辩论中,议会国务秘书拉尔夫·布劳克齐泊尔(基民盟)代表联邦国防部部长发言,称“该行动能够持续地提供有关地中海地区复杂局势的情报,对于识别和消除地中海地区的威胁有着重要作用”^⑨。

① Dr. Peter Struck, Bundesminister der Verteidigung, BT PIPr 15/25, 13. 02. 2003, S. 1895 A.

② Heidemarie Wieczorek-Zeul, Bundesministerin für wirt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und Entwicklung, BT PIPr 16/49, 19. 09. 2006, S. 4810 B.

③ Gert Winkelmeier (fraktionslos), BT PIPr 16/49, 19. 12. 2006, S. 4815 B.

④ 同上, S. 4815 A.

⑤ 默克尔政府时期使用“有益于所涉及国家/地区”论式的频率为 10.8%,上升了 0.2%,仅次于“所涉及国家/地区基本利益”论式(18.3%)和“军事行动必要性”论式(15.5%)。

⑥ Dr. Frank-Walter Steinmeier, Bundesminister des Auswärtigen, BT PIPr 16/49, 19. 09. 2006, S. 4800 B.

⑦ Dr. Dietmar Bartsch (DIE LINKE), BT PIPr 18/142, 02. 12. 2015, S. 13885 A.

⑧ Dr. Norman Paech (DIE LINKE), BT PIPr 16/195, 17. 12. 2008, S. 21063 A.

⑨ Dr. Ralf Brauksiepe, Parl. Staatssekretär bei der Bundesministerin der Verteidigung, BT PIPr 18/190, 22. 09. 2016, S. 18668 B.

“有益于全球”论式在默克尔时期的使用比例下降,从具体的辩论中可以看出,施罗德时期的政治精英们主要使用该论式表达对于参与军事行动的怀疑和反驳:①担心参与军事行动可能破坏现有的世界秩序,导致以强权为主导的新秩序;在针对伊拉克战争的政府声明中,施罗德认为“派兵有可能导致通过战争解除武装的手段的盛行,参与解决问题的不是相关国际组织,而是某个唯一的世界大国。而伊拉克战争将成为打开一个不是基于条约或共识,而仅仅是强权的新世界秩序的大门的先例”^①;②参与军事行动即参与战争,最终可能导致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例如在科索沃行动辩论中,民社党的居西认为“战争的受益者是军备工业……战争将导致新一轮的军备升级”^②;③军事手段无法起到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作用,反而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民社党的罗兰德·克劳斯认为“阿富汗战争无法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结构,有可能导致世界反恐联盟分崩离析,以及破坏阿拉伯和中亚地区的稳定”^③。虽然在默克尔时期,德国政治精英在关于外派的辩论中使用“有益于全球”论式的比例下降,但这一时期呈现出关于行动可能对联合国的权威性和行动能力造成影响的考虑:在黎巴嫩行动辩论中,社民党代表瓦尔塔·科尔波(Walter Kolbow)认为“我们基于国际法的规定、应国际法的要求参与该军事行动,这有益于加强联合国安理会对于武力使用的垄断控制”^④。

“能力和准备”论式的子论式使用情况变化:

施罗德政府时期,德国政治精英在使用“能力和准备”论式时主要集中在对“准备”论式的使用上,而在默克尔时期“能力和准备”论式使用整体增加,且“能力”论式的使用增幅更为明显^⑤。

可以看出,施罗德时期德国政治精英关于本国军事能力的讨论较少,主要关注德国,以及包括德国在内的行动集体是否做好承担责任与风险的准备,倾向于采取非军事化的、和平主义的手段解决冲突:例如在科索沃行动辩论中,来自联盟 90/绿党的汉斯-克里斯蒂安·斯特罗布勒(Hans-Christian Ströbele)提出“科索沃行动将给科索沃及其邻国带来巨大的风险,这是我们无法克服的”^⑥;在阿富汗行动

① Gernot Erler (SPD), BT PIPr 15/25, 13. 02. 2003, S. 1890 D.

② Dr. Gregor Gysi (PDS), BT PIPr 14/43, 11. 06. 1999, S. 3574 B.

③ Roland Claus (PDS), BT PIPr 14/198, 08. 11. 2001, S. 19296 C.

④ 《联合国宪章》将禁止在国际关系上使用武力作为最根本原则,并通过集体安全体制作为其实施机制,该体制的核心就是将武力的使用置于联合国安理会的垄断控制之下,自卫权作为例外情形。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单独使用武力是该机制受到大国单方面使用武力威胁的负面案例。

⑤ 默克尔政府时期使用“能力”论式的频率上升了 1.6%,“准备”论式 0.7%。

⑥ Hans-Christian Ströbele (BÜNDNIS 90/DIE GRÜNEN), BT PIPr 14/43, 11. 06. 1999, S. 3583 C.

辩论中,施罗德坚定地声称“德国已经做好参与战斗并且取得最后胜利的准备”^①,而反对阵营的民社党代表克劳斯提出质疑,认为“北方联盟可能并不具备再次成功打击塔利班、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②。

默克尔政府时期,政治精英在辩论中对于是否做好参与军事行动的准备以及是否具备参与军事行动的能力上呈由“被动应对”向“积极有所作为”方向转变,行为体也呈现由“包括德国在内的集体”到明确提出“德国”的转变:^①在默克尔政府时期的早期,政治精英在辩论中主要将德国作行动集体的一员,强调联合行动部队具备共同行动的能力以及做好共同行动的准备:例如在黎巴嫩行动辩论中,联邦国防部部长荣格表示“我们已经考虑了该任务的各种可能性,并做好准备为维护该地区的长期稳定做出贡献”,联邦外交部部长施泰因迈尔强调欧洲作为一支整体力量“将成为给中东地区带来和确保和平的重要因素”^③。^②在后期的反“伊斯兰国”行动的辩论中,政治精英更多地抛开集体的表达方式,直接将德国作为行为主体进行辩论,对象也转变为“德国军事能力”这种明确的提法:例如,“我们具备欧盟及北约内其他很多国家不具备的空中加油的能力,我们的盟友在行动中需要我们这种能力的支持”^④。

四、结 论

本文以德国联邦国防军外派为例,基于“联邦国防军外派语料库”,借助计算机软件对关于德国安全政策行动辩论的议会记录做论证分析,以识别和描述从施罗德到默克尔政府时期辩论中呈现出来的德国安全政策话语变化,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德国安全政策话语中身份自我定位的延续或转变。

首先,德国的安全政策话语没有彻底摆脱“克制文化”的影响,德国的“文明力量”的定位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在面对冲突和危机时注重解决手段的规范化和法制化,并以和平、自由、民主、人权等为导向。从施罗德时期到默克尔时期,德国联邦国防军外派辩论中,德国政治精英最主要使用“必要性”论式,围绕全球依赖性、欧洲一体化、德国和所涉及国家/地区的基本利益进行辩论,关注军事行动是否具有必要性,直接讨论将军事行动作为冲突处理手段的合理性;居于其次的是对“义务”论式的使用,主要围绕法律法规、普适原则、期望请求和德国历史进行辩论,关注德国参与军事行动是否符合规范和法制。

^① Bundeskanzler Gerhard Schröder, BT PIPr 14/198, 08. 11. 2001, S. 19287 C.

^② Roland Claus (PDS), BT PIPr 14/198, 08. 11. 2001, S. 19297 B.

^③ Dr. Frank-Walter Steinmeier, Bundesminister des Auswärtigen, BT PIPr 16/49, 19. 12. 2006, S. 4799 C.

^④ Jürgen Hardt (CDU/CSU), BT PIPr 18/142, 02. 12. 2015, S. 13892 C.

其次,德国政治精英在安全政策话语中呈现出的身份自我定位存在着从“战争反思者”到“利益谋求者”的转变,其中包括对于使用军事手段的态度也从“根深蒂固的克制文化”到将其视为“前摄性”和“反应性”的危机应对策略。施罗德政府时期,政治精英围绕普适原则和德国历史的辩论较多,通过追溯和回忆反思纳粹德国的历史,强调德国应当为世界的和平稳定承担责任;而默克尔政府时期,政治精英围绕法律法规和期望请求的陈述呈明显上升趋势,对于德国基本利益和有益于德国的讨论也呈上升趋势,但增长得较为缓慢,通过捍卫国际法准则加强德国在国际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的合法化、正常化,在对自身角色认知的过程中重视外部对德国角色的期望,并以此为前提逐渐承担起更多责任,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追求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辩论中直接围绕军事行动必要性的陈述在默克尔时期呈下降趋势,施罗德时期政治精英主要对使用军事手段持怀疑态度,对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抱有乐观态度,而默克尔时期政治精英认为解决冲突需要一揽子手段,其中军事手段必不可少,并指出派遣特派团能起到预防性维稳作用。

第三,德国积极谋求在国际安全政策中承担更多责任和发挥领导作用。在各种国际平台为自己赢取信任和影响力的同时,德国的安全政策话语中体现一种“服务型领导者”的过渡身份。无论是施罗德时期还是默克尔时期,围绕所涉及国家/地区基本利益的讨论比例都很高,且存在增长趋势。结合其他论式使用的增减趋势可以看出,相较于默克尔时期,施罗德时期德国政治精英围绕“普适原则”“德国历史”“有益于全球”论式的辩论较多,关于国家/地区基本利益的陈述较多,这可以解释为是出于对战争的反思,重视对战后世界和平稳定的维护,通过参与联合行动赢得信任,以实现德国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的正常化;而默克尔时期围绕所涉及国家/地区基本利益、全球依赖性、德国基本利益、欧洲一体化以及围绕有益于行动涉及国家/地区、有益于欧洲和德国的陈述均呈上升趋势,强调通过军事行动实现当地的和平、稳定、安全、自由,致力于帮助当地国家建立政权、实现当地政府独立自主和各方面行为能力的建设,将其作为追求德国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途径,塑造出一种“服务型领导者”的身份。这种身份定位首先强调“服务”,即德国在作出安全决策时将“他人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前;另一方面,通过战略制定、任务分配等过程及其结果可以看出,德国在积极追求更多的“领导权”,希望成为事实上的“领导者”。这种身份的选择可以避免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由于德国“领导国家”身份愈加突出而产生对于“军国主义复辟”的恐慌,从而避免由于恐慌而施加在德国身上的诸多限制,影响德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为自己谋求更多的利益。

责任编辑:郑春荣

INHALTSANGABE

Der Wandel im deutschen sicherheitspolitischen Diskurs : Eine Argumentationsanalyse basierend auf parlamentarischen Debatten über Auslandseinsätze der Bundeswehr

Ni Xiaoshan/Zheng Chunrong

Als Vorbild der „Zivilmacht“ hat Deutschland stets die Notwendigkeit betont, diplomatische Mittel zur sicherheitspolitischen Lösung von Krisen und Konflikten einzusetzen. In den 1990er Jahren, insbesondere nach dem Regierungswechsel im Jahr 1998, wurden die Parameter deutscher Sicherheitspolitik jedoch nicht nur geografisch ausgedehnt, sondern auch funktional als eine „proaktive“ Strategie der „Krisenprävention“ bzw. eine reaktive Strategie des „Krisenmanagements“ umgedeutet, die immer häufiger den Einsatz militärischer Mittel als Ultima Ratio einschloss. Ausgehend von der These, dass sich die aktivere Sicherheitspolitik Deutschlands auch im Diskurs der politischen Eliten widerspiegeln würde, geht die vorliegende Untersuchung diskursanalytisch vor: Die in der parlamentarischen Debatte zum ersten Auslandseinsatz der Bundeswehr in der jeweiligen Periode verwendeten Topoi sowie diejenigen in Schröders Regierungserklärung zur Nicht-Beteiligung im Irakkrieg und relevanten parlamentarischen Anträgen werden definiert, klassifiziert, miteinander verglichen und untersucht. Dabei lässt sich eine Transformation des Rollenverständnisses im deutschen Diskurs der Sicherheitspolitik feststellen: Der Schrödersc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ist dem „Interest Seeker“ der Merkel-Zeit gewichen. In diesem Prozess entschied sich Deutschland auf Grund der historischen Erfahrungen und Lehren für eine Übergangsidentität des „Servant Leader“. Zusammen mit dem Wandel im Sicherheitsdiskurs der deutschen politischen Eliten betrachtet kann davon ausgegangen werden, dass sich die sicherheitspolitischen Maßnahmen Deutschlands noch weiter verstärken. Dies führt jedoch nicht unbedingt zu einer Neupositionierung Deutschlands als „Zivilmacht“. Die Veränderung deutscher Sicherheitspolitik erfolgt weiterhin prozedural.